

# 晚期罗马帝国的文化困境

金利安

罗马帝国的兴衰问题,始终是发人深省的。罗马帝国不仅开创了西方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进行的诸多重大尝试及所面临的问题,在罗马人那里都似曾相识地经历过了。比如,依靠军事征服建立世界性大帝国、议会政治、法律及司法制度、城市文明、货币流通及通货膨胀、商业贸易、失业问题、垄断问题、财产多寡悬殊问题以及世界观念、人类意识的产生、文化冲突与交融问题等等。本文不想全面地叙述罗马帝国的兴衰问题,而是仅仅探讨晚期罗马帝国的文化困境(本文所说的罗马帝国文化特指它的非基督教文化)。这种困境不仅暴露了作为西方文化根源之一的希腊理性主义的潜在矛盾,而且使西方文化的另一根源——希伯来基督教精神的全面兴起成为必需和可能,两大文化传统的实质性交融亦由此开始。

从传说中的首位国王洛莫路斯(Romulus)于公元前 753 年创建小城罗马,到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毁灭的罗马史,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它分为罗马共和国时期〔即从公元前 509 年罗马人推翻国王塔奎纽(Tarquinius)的暴政统治到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Octavian)(公元前 31~ 公元 14 年在位)当上罗马皇帝,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Augustus,意为美丽、庄严、神圣)和罗马帝国(公元前 27~ 公元 476 年)时期。其中,罗马帝国的历史又往往被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从公元前 27 年到公元 284 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 284 年~ 305 年在位)即位〕和晚期(公元 284~ 476 年)。总的来说,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在早期取得的,晚期则逐步趋于衰落。

罗马帝国是一个地跨欧、非、亚的大帝

退。尤其年轻一代,对神道的执着,如同对政治的热情一样下降到有史的低点。除皇室祭祀外,民俗的神社祭祀大都流于形式,被习俗化了。神道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已淡出人们的意识,作为风俗习惯逐渐隐入传统的背景中去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国家神道对国民的影响也像烟雾一样,就此消散。其中不少观念和

意识都潜入人们的骨子里,溶入国民性中。在当前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复活国家神就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与国情、民情的发展趋势相背离。作为一些自民党政客和右翼分子的意愿,仅仅表明他们尚未从历史的阴影和惯性中走脱出来

国,在其版图达到极限的图拉真(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时代,它的边界东起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南抵撒哈拉大沙漠,西及不列颠,北至莱茵河、多瑙河。罗马帝国已将它当时所接壤的开化世界均置于其统治之下,边界之外仅存诸如日耳曼等几个蛮族了。因此,“在罗马人的心目中,罗马帝国在本质上,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sup>①</sup>这种世界性大帝国的气度与观念,对基督教及后来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相应于地域上的泱泱大国,罗马人在政治上亦曾不失大度。帝国早期的皇帝延续了共和国的元老院制度并加以扩充,增加了许多元老席位。帝国政府对各地的管理采取了行省制的办法。在屋大维统治的时候,帝国有28个行省,以后通过新增和重划,戴克里先在位时,行省数达到99个,到康士坦丁(Constantin,公元306~337年在位)时代增至120个之多。在帝国早期的两个世纪中,“帝国逐渐抹去了罗马公民和省区属民之间的差别,并由于两类人民的同化,保证了省区人民可享受法律上的平等保护,特别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帮助,以及那经常而有效能的行政利益。”<sup>②</sup>罗马帝国还不断扩大享有公民权的范围,公元212年,其范围扩大到了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男子。<sup>③</sup>因此,罗马人不仅突破了雅典人那狭隘的城邦情结,而且萌发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意识。

这样,文化在罗马帝国就被置于一种空前宽泛的世界背景和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在帝国初期的两百年来年里,这种新的环境也曾经给罗马社会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然而,罗马帝国在文化上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人们的价值关怀和道德教化问题,尤其到了晚期,帝国文化的这一困境更是暴露无遗。

**罗马文化**原先是独立于当时已高度文明的希腊世界而发展的。维系早期共和国的文化纽带是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传统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并由家庭、国家和宗教三者共同构成文化承传的基础<sup>④</sup>。罗马人从小就由母亲培养其对家庭的绝对忠诚以及保持祖先荣光的人生信念。长大后随同父亲在军营里或议会广场上学习政治技能,磨练意志和品格,顺便也学会一些必要的文字和实用知识。宗教则是一种密切联系着罗马人的家庭生活、农业生产及国家事务的祭仪活动,实质上是由传统和情感所支撑的崇拜仪式。这种土生土长的罗马文化在以农业为主的早期共和国是有稳固的基础的。因为当时的社会成员主要是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所构成,军队兵士基本上是从亦耕亦农的平民阶级中招募的。

到了帝国时期,古罗马文化传统的旧有基础已基本丧失,帝国文化的教育基础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由希腊式的学校教育取代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承担起了道德教化的功能;元老院的世袭制度被打破,地位下降,它对传统的维护作用削弱了;军队从原先的自由民组织转变为职业雇佣军,失却了爱国主义大熔炉的作用;宗教演变为帝王崇拜的官方祭仪和各种地方宗教并存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分别考察一下它们是如何使文化陷入困境的。

罗马帝国早期的文化繁荣,主要是引进希腊的教育制度并积极吸收希腊文化的结果。不过,罗马人终究是帝国的拥有者,希腊人毕竟是帝国行省的属民。罗马人并没有从希腊人那里学习政治和军事的技艺,<sup>⑤</sup>而是利用希腊哲学进行自身的道德教化。<sup>⑥</sup>因此伊壁鸠鲁学派、逍遥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亚学派、柏拉图学派、新柏拉图学派等希腊哲学,曾在罗马帝国广泛流传,哲学讲堂成为城市里的常见景观,哲学教师不计其数,从而出现了哲学的大众化趋势。尤其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anus,公元161~180年在位)当政时期迎来了通过哲学实施道德

改造的高潮,乃至总督一级的高级官员也能找到有哲学修养的人。这样,罗马人就不再仅仅满足于依靠传统来指导生活,而是转向了希腊哲学的理性道德。<sup>⑦</sup>

然而,罗马人将希腊哲学当作道德教化的实用目的,首先使哲学本身及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

第一,消解了希腊哲学那“始于惊讶”的认识冲动。例如,对罗马帝国影响最大的斯多亚哲学,虽然肯定了人人具有理性,但是它并不以理性去作认知的努力,而是关切如何凭理性使人成为善的问题。因此,相比于希腊哲学,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发生了这样的重点转移:“从智慧到善,从知识到意志”。<sup>⑧</sup>若套用苏格拉底的命题来说,前者主张“知识就是德性”,后者乃强调“德性就是知识”。罗马人在丧失希腊哲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其哲学也就失却了创造的生机。因此,罗马帝国时期,“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sup>⑨</sup>希腊人的理论科学也就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而仅仅发展了某些实用技术,诸如建筑、医学等。

第二,消解了理性力量与帝国现实之间的紧张感。世界性大帝国的生存环境,使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具有更宽泛的世界观念和更普遍的人类意识。同时,由于帝国强权的永恒存在是它们的基本前提,它们的哲学理性始终未能彻底地支撑起这种世界观念和人类意识。因为正如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现一般译为特勒尔奇)所指出的,若像近代理性主义把理性视作神圣贯彻到底,势必走向社会革命。<sup>⑩</sup>在理性理想和帝国现实所构成的紧张感中,道德教化最终又成了消解的方便通道。如斯多亚哲学凭理性的力量发展了自然法和人类统一体的社会理想,但它回避了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手段,只是强调个人应实现其最高本性并经由理性法则所指导的问

题。<sup>⑪</sup>西塞罗虽然也讨论了“共和国”的社会理想,他却把这种理想的共和国回溯到了古罗马,表示在那遥远的过去曾存在过,至于现实或将来,“如果人们都遵从其真正的本性,那么一切都遵从正义了”。<sup>⑫</sup>说白了,依然是限于道德教化的框框。道德教化在消解了理性力量与帝国现实的紧张的同时,也抑制了人类的理想。罗马人在文学、艺术上的创造力逊色于希腊人,亦与此有关。理性的力量无从建立可亲近的人类理想,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所暴露出来的一大困境。可人类的理想冲动终究是不会枯竭的,于是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表现出宗教的倾向,像新柏拉图主义已颇具神秘的色彩。罗马哲学的道德教化之努力及理想的困境,后来为基督教所承担了。基督教不仅推进了道德教化问题,而且力图克服这种理想的困境。

另外,以哲学从事道德教化是有其限度的。首先,哲学是有教养者的思想,对哲学的消受离不开良好的教育和自觉的理性思维。因此,哲学所给与的教化总是“向上的”,面向少数人的。诸如斯多亚哲学虽然理论上承认人人拥有理性且能成善,在实践上却要求相当程度的自我克制和自我教养,而这是超于绝大多数人所能及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曾将斯多亚哲学与其穷人学派犬儒主义的不同命运相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哲学理性教化的局限性。他说,斯多亚哲学永远不能吸引大众,当它自身消亡时,它的“穷亲戚”犬儒主义,却因理智上较淡薄,更能吸引众人而存活下来了。<sup>⑬</sup>其次,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斯多亚哲学的命运一样,任何一个哲学学派,均有其兴衰过程。哲学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终究无法摆脱“一岁一枯荣”的命运。比方说,斯多亚哲学虽在罗马盛极一时,从尼禄(Nero,公元54~68年在位)到马可·奥勒时期,它是居支配地位的哲学<sup>⑭</sup>,但是,到奥古斯丁时代,在其学校教育中已很少

听到斯多亚哲学的声音。真正影响他的是新柏拉图主义。因此,以变易的哲学理性,从事永恒的道德教化和价值关怀,终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再者,从罗马帝国教育制度本身来看,真正能享受良好教育的,总是少数人的事。罗马帝国实行三级学校的教育制度:初级学校(7~12岁);文法学校(12~16岁);雄辩术学校和哲学学校(16~20岁)。其中后两者都要由家庭付费。当时能踏进校门的本已不多,能付费学成的则更少了。奥古斯丁就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一年。至于军事征服而产生的大批奴隶,罗马帝国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更无法奢谈学校教育了。当然,由于当时的奴隶或在城市的手工场中或在乡村的大庄园里整日劳作,工余则像牲口一样被关住在一起,帝国无须操心他们的道德教化问题。但是,奴隶也是人,也有他们的价值关怀。于是,基督教最先便在这些帝国文化所不及的奴隶之中渐渐兴起了。

罗马帝国文化自身的矛盾、文化载体的狭小,说明帝国的文化基础并不扎实。而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一步瓦解了其文化的基础,使整个帝国文化出现了全面的衰退。

## 罗马帝国的早期繁荣与

希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建立在城市文明和社会等级结构之上。汤普逊曾强调指出:“罗马帝国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机地汇合而成的一个大联合。各城市宛如人体里的细胞,是最小的,可是最有活力的有机体。”<sup>④</sup>正是在城市中,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及各行省议会政治得以存在,工商业得以兴旺,学校教育和哲学大众化得以兴盛,剧院、图书馆、浴场等公共设施大量兴建。然而到了晚期帝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等级结构破坏了,城市衰败了,乡村风气席卷了城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晚期帝国由于经济上的困顿,政府所摊派的赋税日趋沉重。因此,权力大于义务的元老贵族成了中等阶级追逐的目标。这个中等阶级主要源于军事征服中兴起的骑士阶级,其中有大地产所有者,亦有腰缠万贯的富商。这些挤入元老院的新贵族,虽然有巨额资产,但已不代表有教养的阶层,他们对财富的兴趣远大于对罗马文化传统的钟情。当然,挤入元老贵族中的终究是少数,中等阶级中的绝大多数被沉重的捐税逼向了贫困与破产。这样,在晚期帝国,不仅元老贵族不复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强大力量,而且作为城市文明主要驱动力量的中等阶级亦被瓦解了。

另外,“为了挹注亏空,政府往往占取城市的公地,并照例把它们售给附近发财的地主,这批人的后嗣,后来就成为这个城市和它的周围土地的封建主了。”<sup>⑤</sup>农业经济直接挺进了城市。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不堪贫困,尤其是因晚期帝国强制规定他们的子孙亦须世袭,故大批地逃往封建地主的庄园中。封建主的势力不断得以扩大,他们大量地并吞周围的土地。在庄园内不仅有奴隶,而且产生了隶农(Colonus)。政府的司法和赋税等权力被拒于封建主的领地之外,大领地成了国中之国。

此外,晚期罗马帝国还现出了严重的蛮族化趋势。罗马帝国本来就是依靠军事征建立起来的。军队在帝国事务中向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戴克里先、康士坦丁为扼制帝国的衰落趋势而进行的改革,更是强化了军队的地位。晚期帝国的政治重心,主要不是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皇帝与军队的关系。然而,此时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帝国从罗马化程度很低或根本没有罗马化的贫困地区,尤其是从善战的境外蛮族,诸如日耳曼中雇佣大量兵士,构成罗马军队的主体,从而使军队蛮族化了。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纽带在军队中断裂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的追逐。M。

罗斯托夫采夫曾概括道:军队“所要挟索取的条件有一部分是物资方面的,有一部分在一定程度内是政治方面的,例如,统治阶级所享有的特权必须推广给军队。由于皇帝们未能使自己的权力在立法和宗教方面具有十分明确的根据,所以未能使群众和军队毫不迟疑地信服他们的权力;于是,愈来愈明显,皇帝们只是因为得到兵士的欢心才取得统治权。”<sup>①</sup>除了军队本身所施加的这些强大压力外,在蛮族化的粗暴氛围中得以升迁的军官还纷纷进入政府与社会上层。他们热衷于赋税,鄙视文化与教育。因此,在军队自身彻底蛮族化的同时,罗马社会也蛮族化了。

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表明“希腊罗马文明同化力之逐步衰退。城市不再能吸引广大的乡村居民,这就是说,不再能使他们希腊化或罗马化。情形与此相反。乡村的蛮族风气反而开始把城市居民卷进去了。”<sup>②</sup>这样,促成早期帝国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逐步分崩离析了,罗马帝国文化也随之衰落。于是,分布于各城市中的教会历史地承担起了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并以其特有的立场予以改造和传播,使欧洲文化在罗马帝国毁灭后仍然得以统一与延续。

**晚期罗马帝国**在以哲学为象征的上层文化的衰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宗教、迷信、巫术却愈演愈烈了。

罗马帝国的文化本来就有一个宗教的主导层面。早在亚历山大(Alexander,古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56~323年)时代,随着他对东方世界的大规模征服,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便开始逐步取代了古希腊的美丽神话。从罗马共和国后期起,由于军事征服的扩展及交通的便利,大量奴隶从东方被送往西部地区,促进了东方宗教的广泛传播。除犹太教及基督教外,“这些东方宗教中最为流行的有发源于小亚细亚的大母神(赛比利)(the Great Mother of the gods)与阿提斯

(Attis)崇拜;埃及的伊希斯(Lisi)崇拜与萨拉匹斯(Sarapis)崇拜;波斯的密特拉教(Mithraism)这些宗教互相掺杂混合,又与它们流传到的地区的更为古老的宗教相结合”<sup>③</sup>所有这些宗教都来源于自然崇拜,讲一位救世的神,充满神秘主义,注重仪式。一般说来,罗马当局对各种各样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只是当某些宗教祭仪或组织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时,政府就一次次地加以限制或铲除。若它们没有扰乱现存秩序,则作为一种通则,政府对它们的传播不予监管。事实上,“在罗马,每一种教派与每一个先知都在最高的各个当政的派系里有其代表,有时候还获得他们的支持。”<sup>④</sup>因此,上述这些宗教在晚期帝国都有大量信众。不过,大众对这些宗教的信仰主要依靠各种祭仪,并且普遍掺杂着对神灵、鬼怪、梦幻、奇迹、占卜、神喻的相信,充满着迷信与巫术的色彩。这种状况是这些宗教(后来基督教统称之为异教)所无法克服的。除此之外,在民间中还存在极其原始的崇拜形式,“每一城市必有一位保护神,或男或女;每一行业,每一农庄,每一泉水,每一家庭,每一人生大事件,诸如结婚、生育等也都有神明庇佑。”<sup>⑤</sup>

在晚期罗马帝国,广大民众完全以宗教为依皈,各种神秘宗教在上层阶级中广泛流传的现象,乃表明其社会心理倾向发生了重大的位移;社会下层的心理倾向崛起并逐渐支配了上层阶级,或至少支配了其中大多数人。<sup>⑥</sup>作为上层文化之象征的哲学,亦逐渐演变为这种新的心理倾向的产物。前面我们曾经提起希腊罗马哲学自身在以理性建立人类理想上所遇到的难题,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Plotinus,卒于公元270年)则干脆宣告了理性自身在此难题上的无解。他否认了“在肉体中的灵魂能够熟睡”,亦即仅凭人类理性无法建立起永恒的真理,从而转向了超理性这一“摆脱了肉体的灵魂”,沉浸于为偶尔的狂

喜所温暖的“太一”世界中<sup>②</sup>。然而,由普罗提诺以理性之路所揭示的人类这一原初的神秘感,却被他的后继者转化为迷信的渊源。在波菲利(Porphry,卒于300年)的著作中,尤其是在杨布利柯(Iambichus,卒于公元330年左右)的著作中,普罗提诺的“神秘见解进入实际的生活,而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又使巫术与邪术更加为人们所信,灵魂需要神、天使和魔鬼的帮助;神灵本质上是不可思议的,而巫术是达到神灵的途径。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奖励且吸收流行在一个衰颓时期的一切民间的迷信,巫术和占星术的一切发展,以及一切追求苦行的病态渴望”。<sup>③</sup>在古希腊,哲学本是从神话、迷信、巫术中脱胎出来的,并在对它们的抗争中理性的智慧得以不断地发展。然而在晚期罗马帝国,哲学又重新为宗教崇拜、迷信、巫术所俘虏了。如何从形形色色的“神秘感”中阐扬“神圣感”,则历史地留待基督教予以解决了。

另外,除了民间中自发的宗教崇拜,罗马帝国还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官方祭仪。起初,官方祭仪主要是敬拜古代的神祉,诸如丘比特(Jupiter)、朱诺(Juno)、密涅瓦(Minerva),因而还保存着古罗马宗教中的那种爱国主义色彩。不过,既然是官方祭仪,自然就要与帝国的权力发生密切的关系。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关于他是神的化身的信念就产生了,他的塑像到处被竖立。后来由国家设置了祭司制度,按行省组织,负责崇拜仪式。从3世纪上半叶开始,帝国祭仪极大地扩展开了,皇帝被当作万能的创世主在人间的代表。这位万能的创世主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位宇宙性的太阳神的观念来表达。帝国祭仪的扩展,一方面是由于上述的罗马社会日趋浓烈的宗教气氛,另一方面是因为趋于专权的皇帝力图在宗教中强化其权力的基础。面对帝国的衰颓趋势,从戴克里先开始,“着重加强了他的权力的超自然性和神圣性,其表现为皇帝与上帝的一体

化和宫廷中之施行东方式的仪节”,使帝国祭仪与对皇帝个人人身崇拜直接相关了。<sup>④</sup>

哲学衰落以后,宫廷中的这种政治动机和宗教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帝国政府调整它与基督教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公元311年4月罗马皇帝格里里乌(Galerius)与西部领袖康士坦丁、东部领袖李锡尼(Licinius)之所以共同签署了关于基督教的《宽容敕令》,就格里里乌来说,与他长期重病有关。因为敕令中有劝告基督徒为格里里乌三人祷告的话,表明他相信这样做基督徒的上帝可能救他。<sup>⑤</sup>但格里里乌此后没几天便一命呜呼了。为了争夺帝位,康士坦丁与李锡尼结成一方,另一方为马克西迈努斯·戴亚(Marximinus Daia)和马克森希乌(Maxentius)。当时,戴亚在亚洲和埃及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马克森希乌则坚定地支持异教。这样,康士坦丁与李锡尼便乘机充分地利用基督徒对他们的好感增强自身的势力。有趣的是,312年,康士坦丁与马克森希乌在罗马城以北发生大战的前夜,康士坦丁梦见了上帝赐予他有关克敌致胜的预兆,而且在这场决战中他果然获胜了。<sup>⑥</sup>这就更增强了康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迷信。313年他与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双方同意给基督教以完全自由和对其财产予以法律的保障,史称《米兰敕令》。323年康士坦丁打败李锡尼独掌了罗马帝国的大权以后,基督教尽管仍与其它宗教处于竞争发展的同等地位,然而由于受到康士坦丁的偏爱与支持,基督教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增强。

随着社会愈倾向宗教化,各个教派及其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也就愈大。因此,帝国已必须在各种宗教之间作出慎重的选择了。否则,不仅皇权的宗教基础不牢靠,而且会引起诸种分裂的危险。朱里安(Julian)在公元361~363年期间曾取缔基督教,重振异教,但未成功。于是,到了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79~395年在位)颁布敕令,

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 391-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违者受到惩罚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者同。基督教因此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

这样,就皇帝自身来说,终于为其权力奠定了统一的宗教基础,并依靠强权取缔了由宗教各派别所引发的利益之争。同时,对广大民众来说,其宗教情感在基督教中继续得到宣泄。教会承担起了民众的道德教化和理想憧憬的功能。

然而,信仰的因循法则与社会世俗的运行法则毕竟是两码事。罗马帝国虽然解决了信仰问题,却无从摆脱其灭亡的命运。公元 395年,提奥多西一世去世时传位给他的儿子,荷诺留(Honorius)得帝国的西部,阿卡狄(Arcadius)得帝国的东部。这样罗马帝国就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公元 410年,罗马城落入西哥特人之手,公元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日耳曼人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此结束。

**罗马帝国的毁灭**,使这片浩瀚的土地进入了分崩离析的时代。但是,欧洲的文化却在基督教中得到了统一与延续。罗素深刻地概括了这场历史巨变以后,由基督教所继承下来的西方文化的一大基调:罗马人的世界性“观念就传给了基督教会;所以尽管有佛教徒、儒教徒以及(后来的)回教徒,但基督教会依然是‘公教’。Securus iudicabit orbis terrarum(无畏地审判全世界)是基督教会从晚期斯多亚派那里所接受过来的一条格

言;它之打动人心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的显著的大一统性。自从查里曼以后,在整个的中世纪里基督教会和神圣的罗马帝国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尽管人人都知它们在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人类的家庭、一个公教、一个普遍的文化、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这种观念自从它被罗马差不多实现以来,始终不断地萦绕着人们的思想。”<sup>⑩</sup>

可是,历史已将我们带入必须彻底反省这种观念的时代了。

注释:

①②③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6,上册,第 355-352-355-366页。

④⑤⑥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上册,第 5-54-55页。

⑦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7,第 461页。

⑧⑨⑩⑪⑫⑬ M. L. Clarke: *The Roman Mind*, London, Cohen & West Ltd, 1956,第 2-3-8-7-7-124-52-50-124页。

⑭⑮ [英]W. 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89,上册,第 106-111页。

⑯ 特尔慈(Troeltsch,亦译特勒尔奇):《基督教社会思想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第 68页。

⑰ 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s*, III, X V II. 42.

⑱⑲⑳㉑ [美]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6,下册,第 671-675-724-724-725-694页。

㉒㉓㉔㉕ [美]威利斯顿·沃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11-9-127-127页。

㉖ 俄国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曾对普罗提诺的这一思想作了精彩的阐释,参见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发狂的演说(关于普罗提诺的神魂颠倒)”一节,三联书店,1992。